

任 洁 著



On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唯物史观中的 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任 洁 著



On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
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任洁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04-9181-1

I. ①唯… II. ①任…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183 号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1)
二 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	(8)
三 文化和制度概念的界定	(14)
第一章 文化对制度形成的作用及其实践基础	(23)
第一节 文化对制度形成的作用	(24)
一 制度在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的合力中形成	(24)
二 文化孕育自然演进制度	(27)
三 文化导引理性建构制度的生成	(32)
第二节 文化对制度形成作用的实践基础	(36)
一 制度对文化的固化作用	(37)
二 扬弃文化和制度的循环论证	(40)
三 文化对制度形成作用的实践根基	(42)
第二章 文化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及其限度	(51)
第一节 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	(53)
一 文化濡化与制度变迁	(53)
二 文化涵化与制度变迁	(57)
第二节 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	(60)

一	文化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因	(60)
二	文化作为制度变迁的阻力因	(72)
三	动力因和阻力因矛盾的解决	(76)
第三节	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限度	(83)
一	制度变迁的实践原因与文化依据	(83)
二	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的对立	(86)
三	文化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一个变量	(89)
第三章	文化对近现代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	(93)
第一节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制度变迁的现实情境	(96)
一	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亲缘关系	(96)
二	现代化的模式与制度变迁的模式	(113)
三	制度变迁与文化滞后矛盾的凸显	(120)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制度变迁的文化基因分析	
——	以西方为参照	(128)
一	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	(129)
二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140)
三	性善论与性恶论	(145)
第四章	中国制度变迁的现实与趋势	(153)
第一节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现实与趋势: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	(153)
一	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历时性关系	(154)
二	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共时性关系	(155)
三	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本质与关系的认识	(157)
第二节	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现实与趋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65)
一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	(166)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发展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	(169)

三 破除“普世民主”的理论幻象与实践陷阱·····	(173)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坚持与完善·····	(188)
第五章 全球化与中国制度变迁的文化理念创新·····	(198)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境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	(198)
一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发展的机遇·····	(199)
二 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202)
第二节 文化自觉问题的缘起及其实现路径·····	(212)
一 文化自觉问题的缘起·····	(213)
二 世界各民族文化自觉的实现路径·····	(217)
三 中国文化自觉的实现路径·····	(219)
四 综合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23)
第三节 顺应中国制度变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29)
一 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	(229)
二 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38)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	(244)
一 思想导引·····	(245)
二 文化认同·····	(248)
三 制度评价·····	(254)
结语·····	(261)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86)

导 论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文化与制度问题分别是学术界研究的两大热门话题，学界对中国制度变迁、传统文化转型与文化建设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始终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诚然，1840年之后，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但是，中国人民在面临鸦片战争之后的民族存亡问题时，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封建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的政治态势，各种政治主张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离不开对文化与制度关系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释。制度变迁与文化建设成为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两条主线。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及至今天的改革，一方面围绕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展开；另一方面是伴随西方文化冲击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全盘西化论”、“国粹论”、“折中调和论”是主要的文化思潮。“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的争论实际上探讨的就是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们习惯上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划分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且速度、难易程度呈递增关系，但现实实践往往比理论分析复杂得多。在文化与制度关系上，有学者撰文《文

化变迁是制度变迁之根?》^① 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思考和讨论: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孰先孰后?文化变迁一定在制度变迁之后吗?《文化与制序》^② 一书从文化与制度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视角比较和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制度化和制度变迁路径,主张文化与制度密不可分,文化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提供“拟子模板”(文化基因),制度承载和保存着文化。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正是在制度变迁和文化演进的互动中激励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③ 一书中的“制度与文化”一节分析了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文化观念规定制度,制度强化文化观念,制度强化的文化观念赋予制度以特色。同时,该书强调指出,说文化观念规定制度,不意味着说文化观念是制度的发生论根据,而是说文化观念是制度的直接依据,制度的发生论根据在实践,主要是物质生产实践。

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基本制度的视角,阐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言,仅有对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追求是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学者认为,现实中存在“制度社会主义”和“价值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全面践履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社会主义被称为“制度社会主义”,而其他诸如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或是限于空想,或是只追求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目标,并没有首先考虑实现或者无力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些社会主义流派被称为“价值社会主义”。由于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保障,所以,“价值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价值追求是飘忽不定的,而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更是举步维艰。瑞典从“职能社会主义”向“基金社会主义”(即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以保障工人有更多权利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

^① 参见萧功勤、朱学勤《文化转型是制度变迁之根?》,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2日。

^② 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的转变过程以及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都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保障作用。^①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东欧剧变从反面印证了人们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认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续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也早在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而这正是苏联东欧剧变的实际情形。^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样面临某种程度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认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③然而，对于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是所有人都将之归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下，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问题。

① 参见余文烈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② 参见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见 <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17/200802/32133.html>。

③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我国的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权利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在发展社会事业，巩固和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在外交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以及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导致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弱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东欧解体、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问题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影响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认同,然而,也恰恰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更凸显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与必要性。至少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欲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文化信仰和价值认同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作用的确重大。

由此可以概括出国内学界关于文化与制度形成、变迁关系研究已取得的基本结论:第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不是人们简单认为的制度变迁在先、文化变迁在后,实际上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第二,文化与制度之间是互动的,文化为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提供基因支持,制度作为文化的载体保存文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第三,文化对制度形成、变迁有作用,但是文化不构成制度的发生论根据,制度形成、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实践。

国外探讨文化与制度形成、变迁的关系问题始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最先从文化、宗教意义上探究了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原因,认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催生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文化因素。由此,韦伯开启了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的一系列讨论。

当然,韦伯的思想也并非横空出世,在他之前也有学者探讨过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关注的焦点在于民主这一具体制度安排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护和延续的三项主要因素,即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法制(联邦制和乡镇自治制度等)以及美国的民情。托克维尔认为,这三项因素对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是不等同

的，其中，美国特殊的民情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具有决定作用。托克维尔写道：“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细节和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个因素使然。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够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① 托克维尔发现，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普遍信奉自由主义的观念便是最大的民情，即个体和自我是分析和观察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视角，同时，个体和自我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民普遍认同、遵循并将之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对此，托克维尔说：“在美国，人民主权学说，并不是一项与人民习惯和一切占有统治地位的观念没有联系的孤立学说；相反，可以把它看成是维系通行于整个英裔美国人世界观的链条的最后一环。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上帝都赋予他以能够自行处理与己最有密切关系的事务所必要的一定理性，这是美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据以建立的伟大箴言；家长把它用于子女，主人将它用于奴仆，乡镇将它用于官员，县将它用于乡镇，州将它用于县，联邦将它用于各州，这个箴言扩大用于全国，便成为人民主权学说。”^② 这种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观念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支撑美国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并使得民主制度顺利运行。

托克维尔还对美国民情作了宗教的追溯，认为英格兰移民的清教教义是美国特殊民情的来源，因为清教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还具有许多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因子。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与民情关系的分析，显然对之后的韦伯从文化精神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起

^①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58 页。

^② 同上书，第 463 页。

源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引发一些学者对韦伯的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主张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存在根本对立的关系,由此将文化与发展、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西方学者关于文化与制度形成、变迁关系的研究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系统论的观点。制度与文化同属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制度的形成、变迁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变迁也必然受文化因素的影响。

第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遵循“自生自发”的模式,制度既不是发明的结果也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为。当然,作为行动者的个体根植于社会文化传统之中,无法脱离社会文化传统对个体的约束和塑造。

第三,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首先,老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制度就是惯例,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认为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思则认为制度既包括正式规则(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也包括非正式规则(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人们通常称为文化的因素)。从制度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与制度形成、制度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诺思开创性地指出:非正式制度对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总是正式制度变化与非正式制度变化的统一和互动的过程。即使一个经济体的正式制度有了改变,其实际结果也要取决于新建立的正式制度同只能逐渐改变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①一书中,诺思确立了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他指出了意识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形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在诺思看来,虽然成本收益的大小是影响制度变迁的诱因,人口变化、技术变化、资本存量以及相对价格的变化都是导致制度发生变迁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的习俗惯例、思想认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制度变迁。其中,诺思着力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作用。现实的制度变迁,即使经济发展已经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制度变迁也不必然发生,因为制度变迁还受制于统治者的利益、一般民众的搭便车心理和交易费用的大小。国家可以借助强制力确定制度,并为此项制度的实施提供保障,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但是却无力于人类行为的进一步提升。“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由于考核问题只能通过规则不完全地加以控制。……考核劳动产出的其他检查、监督办法同样是不完全的。‘勤勉的’、‘努力工作的’和‘凭良心做事的’工人与‘懒惰的’、‘工作上懒汉式的’和‘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乃是产出上的差别,它取决于用以减少逃避责任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缺乏远见,故看不到,尽管有一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着相当的可变性。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①

意识形态还可以有效地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的搭便车行为。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存在搭便车行为,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认同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人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时,那么,人们就倾向于在制度发生变迁时采取搭便车行为;反之,人们会赞成改变现存制度,以建立新的、更合理、更公正的制度,从而推动制度变迁。这说明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认同对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作用。^② 在诺思的制度分析框架中,他意识到了文化传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② 参见鲁鹏《实践与理论——制度变迁主要流派》,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统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架构和分析工具去解释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这成为诺思之后的制度经济学家实现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美国历史制度分析学派代表人物艾夫纳·格瑞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格瑞夫发现了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尚未解决的问题。他使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实现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他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强调了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制度变迁的内在制约。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两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长期制度变迁轨迹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格瑞夫以中世纪晚期具有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热那亚和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马格里布的制度变迁过程为例，证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制度的选择和变迁过程。可见，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已经认识到文化对制度变迁起重要作用，但对如何起作用、在何种程度上起作用给出的论述还较少。

二 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

围绕文化与制度，理论界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关于文化的讨论已经几起几落。就国内而言，中国自入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问题就一直是萦绕中国知识分子心头，引起他们焦虑和关注的重大学术和现实问题。这种对文化的关注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次大的文化讨论：一次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运动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文化讨论；一次是伴随全球化进程而展开的文化多元与一元、相对性与绝对性、趋同与趋异矛盾关系的讨论。

就国外研究而言，文化最初出现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人种学家、

民俗学家、人类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进行实证性和经验性的研究，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各民族和原始部落状况的了解。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学者如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等又把文化作为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文化作为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这是和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的。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迫使人们作出反思，其中劳伦斯·哈里森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化与发展关系的大讨论。文化因素究竟是否对社会发展具有影响作用？如果具有影响作用，又是何种程度的影响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①。

就国际范围而言，“文化热”的再次升温与全球化浪潮息息相关。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文化问题也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文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然是一个重要部门，文化成为发达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积极行动，大胆地把文化战略的研究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倍加重视对文化的研究，提出一些文化战略理论，如“后殖民主义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以期为新时期提供谋求霸权的工具。可以说，文化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际政治范围内，信息与文化的优势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宰力量。美国著名的富布赖特基金创始人富布赖特在《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中说：“当今世界外交政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策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向其他国家传播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其下一代。这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胜过军事和外交上的作用。”^① 另一方面，经济政治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大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增强了文化安全意识，防范和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力争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中固守自己的最后阵地，加固自己的心理防线，避免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附庸。

“制度”是中国学界的另一热门话题。近年来关于制度变迁、制度伦理、制度创新、制度与发展等的语词和论题频繁见于公共视听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理论界兴起的“制度热”是伴随中国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学说的引进而逐渐兴起的，并且大有继续走红、蔓延之势。“制度”问题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却早已突破单纯的经济学领域而波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学科领域，呈现出跨学科发展之势。制度似乎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探讨其他理论问题无法逃避的理论视阈。制度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可见一斑。

分析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绝非为了追赶学术时髦，实是意识到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分析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把文化作为“剩余变量”排除在制度分析框架之外的做法，从而有利于人们对制度有更深刻和更全面的把握。因为对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理论问题而言，文化都是深层次的不可不深究的根源。对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分析无疑为人们打开了看待制度演化、变迁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

分析文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立足于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现实。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经阶段，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以市场化、城市化、民主

^① 转引自杜丁丁《对文化国际化趋势的思考——浅析文化国际化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国际观察》（哲社版）1998年第5期。

化、法制化、世俗化等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和必经历史环节。然而问题在于,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肇始于西方,现代化根植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是一种西方“文化的承诺”^①。对西方国家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长、发育和成熟过程,尽管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也伴随着传统和现代的种种矛盾、对立、冲突和选择,但这是单一的、正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矛盾、对立、冲突和选择。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完成这样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弥补缺失的历史发展环节。但是由于现代化肇始于西方,所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会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示范效应,后发国家往往会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为模本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②“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既得成果无疑构成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参照系。

此外,这种参照模仿效应的产生还源于西方文化和社会科学家的塑造和引导。现代化始于西方,与西方文化有着无法分割的亲缘关系,或者说,西方文化是现代化得以在西方首发的文化因子。然而,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现代化作为原发于西方的历史过程,本身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为推动本国自身的现代化配套而生的“文化工程”。发展主义、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文化工程的产物和理论形态。在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塑造过程中,社会科学凭借自身具

① 何中华:《“现代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